

【主题演讲】

# “亚洲”的发明

## —区域在 19 世纪的产生

三谷博（迹见学院女子大学）

译者：梁奕华（东京外国语大学）

如今，“亚洲”一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经常使用，然而其具体所指的范围却相当暧昧。对于现在的日本人来说，“亚洲”可能是指从日本开始，延伸至中国，甚至更远吧。这其中，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应当也包含在内。然而，西方所说的“中东”是否也在其中呢，这个就不确定了。另外，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西伯利亚是否包含在内也是一个疑问。相反，把视点移到地球的另一侧，也就是西欧，那又如何呢？“亚洲”和“欧洲”的界限在哪里呢？这时候，我们经常提到波斯普鲁斯海峡，然而从土耳其中间划出分界线，真的妥当吗？而俄罗斯又属于哪边呢？将一个大陆分成“亚洲”和“欧洲”是否有切实的根据呢？另外，在中国又时不时出现，否认中国属于“亚洲”这样的见解。如果把中国置于世界中心的话，其外部就全是等价的存在，那把地球分成各个区域就没有意义了。

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冠名“亚洲”的各种组织。比如，由北美研究者组织的“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由生长在亚洲的运动员参加的“亚运会”等。然而，哪里属于“亚洲”，哪里不属于，这个概念经常含糊不清。“亚洲”与其外部的界限，因发言人的关心、听众的情况、以及视点立场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变化。

此次演讲主要是概览“亚洲”一词是如何成为一个“区域”名称而被使用的。先归纳一下中心论点，那就是“亚洲”一词是 1880 年左右由日本发明的。“亚洲”一词原来是欧罗巴人用来指其居住区域以东的广漠空间的，后来成为具有具体内涵的区域概念，强调其与外部的差别，包含了某些共通点、内部关联和连带关系。接下来将在此简要描述“亚洲”一词的变迁<sup>1</sup>。

### 1 . “亚洲”概念进入东亚世界

“近代”之前，即欧罗巴的影响席卷世界以前，地球上至少有四个“世界”。中国文化辐射的世界、印度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基督教世界。这样的区分是当然由后世的观察者们进行的，在此之前，生活在各个世界里的人们将自己所在的世界当成一个完整的存在，对外部的世界基本不关心。

“亚洲”一词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世界观。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把地球世界分为欧洲·亚洲·非洲。在欧洲看来，“亚洲”是指欧洲以外的其他区域中的东部区域。与欧洲不同，“亚洲”所指的区域并没有共同的宗教和特征，也缺乏内部联系。在这里，不仅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国家，还有各种宗教，这里至少有五个世界宗教，即儒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亚洲”一词原来几乎是没有具体内涵的。

将这个词引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的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利玛窦。他于 1602 年在北京出版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他将从北西伯利亚至马来半岛的广大区域标记为“亚细亚”，然而相关说明只有对地理范围的注释而已。不久，日本人将此世界地图引入，然而几乎没有人将“亚细亚”这个地理名称用在自己的著作里。之后在世界地理书里，也会设“亚细亚”的相关章节，但其中也只是列举各国的地理风俗而已<sup>2</sup>。估计在中国也是一样吧。

当时，欧罗巴人对东方地区的称呼也有“东方(Orient)”“印度(India)”“鞑靼(Tartar)”等。其中，“东方(orient)”是指“太阳升起的地方”，与古代罗马人所说的“西方(occident)”，即“太阳落下的地方”相对，和“亚洲”一样，也是缺乏具体内容的名称罢了。而其他两个稍微有些内涵。“印度(India)”主要是指居民不阅读圣经的土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将“印度(India)”分为东西两部分。在 1494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里，就分别称为“东印度”和“西印度”。两者均被认为是基督教应当征服的地方。自此之后至 19 世纪，欧美各国都成立了类似“东印度公司”“东印度舰队”等以“东印度”命名的，在亚洲活动的组织。

另外，“鞑靼(Tartar)”则是令欧罗巴人想起被蒙古征服的可怕历史的名词。欧罗巴人将“鞑靼(Tartar)”一词用于满族建立的清朝，这里暗含了“恐怖的野蛮人”的意思<sup>3</sup>。

而中国人和日本人则不接受“东印度”这样一个西方的地理名称。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自古就知道“印度”(天竺)是佛教发源地，将其视为拥有高度文明的地区，并不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而对于“鞑靼”的态度则有不同。清朝将其视为一个种族，认为自己是“鞑靼”的一个种族。而对于人口众多的汉族来说，这个称呼具有将自己视为北方蛮族之嫌，并不愿意接受。而日本则曾经接受，将自己当作是“鞑靼”中的一个种族。不过，“鞑靼”一词的使用也只限定于中国本土以北的蒙古族、满族以及其他种族居住的地方。

于是，中国人日本人并不将自己的居住地称为“东印度”“鞑靼”，而是选择了缺少内涵的“亚细亚”一词。

另外，基本和“亚细亚”同义的“Orient”如今在日语中被译为“东洋”，其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里，也有“东洋”这一词语。然而，这并不是指“Orient”，而是符合中国传统用法的。日本周围的海域被称为“小东洋”，而墨西哥周围的海域则被称为“大东洋”。同样地今伊朗以南被称为“小西洋”，葡萄牙周围则被称为“大西洋”。在他的世界地图里，“东洋”正如字面所表达意思的一样，就是指“东边的大洋”。

之后不久，“西洋”被作为“occident”的译语开始使用。继利玛窦之后，传教士艾儒略编写了《职方外记》。该书于 1623 年刊行，相当于利玛窦所绘地图的注释书，里面将“西洋”一词作为“西方”“occident”的意思来使用，并不是“西边的大洋”。然而，该书里并没有与其对应的“东洋”。

日本人接受了这种用法。18 世纪初期的儒学家新井白石，被将军派去讯问潜入日本的传教士。他将讯问情况记录下来，并将该书取名《西洋纪闻》。同样地该书里并没有作为“Orient”译语的“东洋”。该用法直到 1802 年才在山村才助所著的《订正增译 采览异言》里第一次出现。该书是由山村在新井的《西洋纪闻》的基础上运用其丰富的兰学知识所著成的。“西洋”出现之后，这种不平等的用法持续了将近一百年。这一点令人深思。在中国或许也是同样的情况吧。

综上所述,在欧洲人使用的各种地域名称当中,东亚的居民在17世纪以后只接受了缺乏内涵的“亚洲(Asia)”和“西洋”这两个词汇。并且,相当于“Orient”的词汇,在“西洋”一词登陆中国将近两百年之后才出现。甚至直到19世纪中叶,“亚洲(Asia)”一词也几乎没被使用过。

## 2.“亚细亚”概念的实质化:向地缘政治学用法的转变

1880年,原本并无内涵的“亚细亚”一词,在中日两国因琉球问题陷入危机之时由日本人重新创造,用于指称与西方相对的、具有共通利害关系的区域。

这一变化是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发生的。19世纪70年代初期,报纸开始在日本发行,刊登关于贸易和国际关系的内容。通过报刊,日本人知道惧怕西方称霸世界的并非只有自己,于是不再只关注邻国,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整个亚洲。这源于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是与日本国境相接的唯一西方大国,而且其绵长的国境线从土耳其延伸至中亚、甚至中国,甚至还采取领土扩张政策。这些信息是源于在上海和横滨等港口城市发行的英文报刊。因为英国把俄罗斯当成其全球大博弈的竞争对手,对其密切关注。

日本人通过报刊知道亚洲居民都苦于西方的压迫,但最初只关注自己的困境,尝试通过西化来摆脱困境。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半,为了对抗西方霸权防止其侵略,提倡亚洲团结的主张出现了。这是日本合并琉球不久后的1880年出现的。两国都将注意力从琉球转到朝鲜,将俄罗斯视为共同的潜在对手,于是出现了缓和两国对立关系的动向。

琉球于14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朝,起初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册封的关系<sup>4</sup>,之后17世纪初期,受到日本萨摩大名——岛津家的进攻,被纳入其统治之下。于是首里的琉球政府既受中国明·清王朝的册封,又受制于留驻在那霸的萨摩差役。也就是说琉球政府存活于所谓的“双重朝贡体制”之下。然而,在日本政府通过维新废除大名国家而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之后,琉球也依据西方国际法的“主权”原则,提出排他性的领土方针。另一方面,清朝表示不容许被视为“夷狄”的“藩属”国随意合并。然而日本无视其意志,于1879年合并琉球,使其成为“冲绳县”。清朝多次提出严重抗议,在中国的报刊中甚至出现了主战意见。

然而,两国当时都处于不能发起战争的状态之中。日本两年前才结束了西南内乱,政府苦于负债和低税收的财政状况,舆论也对战争表示厌恶。另一方面,清朝在中亚陷入了与俄罗斯的严重的对立之中。清朝虽然成功镇压了发生在新疆的阿古柏独立运动,但在伊犁与俄罗斯的纷争不断。另外,清朝内部也有人担心将有可能失去朝鲜这个更重要的朝贡国。于是,围绕琉球而产生的敌意在两国都有所缓和,双方都自觉不得不妥协。

妥协的方法就是将俄罗斯当作共同的敌人。在民间层面,两国的报刊舆论都把俄罗斯当成假想敌,主张以“同文同种”为基础两国国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白人”霸权。1880年曾根俊虎在东京成立了“兴亚会”,提倡推进中日韩三国国民间的交流,并发行汉语杂志,在上海设立学校。所谓的“亚洲主义”,以对抗西方主张的“亚细亚”团结一体的运动形式出现了<sup>5</sup>。

另一方面,两国政府都将琉球问题搁置,把目光转向朝鲜,致力于在其建立合作体制。将俄罗斯当作共同的假想敌,为了阻止其进攻朝鲜,制定的策略是在清政府指导、日本政府支持下让朝鲜实现“自强”。1880年,驻东京清国公使馆的黄遵宪受何如璋公使指示著成《朝鲜策略》,并将其交给了正在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sup>6</sup>。该策略的内容就是向其建议“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也就是说让朝鲜

深化其与原来“宗主”中国之间的关系，与日本相提携，并以美国为首与西方国家开展外交关系。1882年，在李鸿章的斡旋之下，朝鲜与美国签订条约，成为了世界政治中的一员。虽然日方并没有被告知这一动向，但这个想法本来就是由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向何如璋提案的，所以日本也默许了这一做法。

但是东北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平静。朝美条约缔结的那年，高宗的生父大院君发动了反对政府改革政策的政变。当时朝鲜政府听从了清政府驻汉城官员马建忠的建议，请求清政府介入，最终平定了政变<sup>7</sup>。两年后，朝鲜的激进改革派在日本公使的支持下，尝试对清政府支持下的朝鲜政府发动政变，最后被清军镇压了。当时，日本公使受到了袭击，44名日本民间人士也被杀害。尽管如此，三国政府都努力防止纷争的进一步扩大，朝鲜赔偿了日本，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协议，双双从朝鲜半岛撤兵了局。

然而，通过这件事，清政府对朝鲜的掌控得到了加强。特别是袁世凯入驻汉城之后，朝鲜政府连像之前那样作为“属国”保持独立都不能了<sup>8</sup>。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政策。当时日本并不具备军事实力，经济状况也萧条，所以并没有单独介入的能力。于是外务卿井上馨采取了与俄罗斯以外的列强、即英国·美国·清朝相支持合作使朝鲜半岛中立的策略，以此来牵制清朝与俄罗斯。

众所周知，日本不介入朝鲜的政策在1894年的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就停止了。日本使用军事力量驱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到半岛上。1890年，日本陆军的创立人山县有朋首相在内阁主张朝鲜半岛中立政策之后，对外政策的框架发生了改变。但在此之前，19世纪80年代，虽然诸如法国侵略越南、英国占领巨文岛等西方列强的扩张活动而使国际社会稍有动荡，东北亚三国的关系还是相对安定的。日本政府在强兵政策没有成效之前采取了温和的政策，而清政府一边尽力避免与邻国的冲突，一边实际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19世纪80年代，东亚三国都意识到了西方的动向，努力调整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创建了国际关系的新秩序，尽管这种稳定的关系只是相对而言而已。

### 3 . 面向 20 世纪的展望

日本因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放弃了东亚均势政策，结果从中国割据台湾走向殖民帝国。1873年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反对征服朝鲜，理由是如果向朝鲜出手，日本并不具备阻止中国和俄罗斯介入的能力。在这之后的20年间，日本经济急速发展，建立起了向海外派兵的经济·军事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外交政策也由防守转向进攻。

另一方面，为了回避日中战争而提倡的亚洲主义此后也不再占据主流地位。虽然，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俄罗斯与中国·日本围绕着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对立加深了，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建立日清同盟共同对抗俄罗斯的言论，但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政策主流是构筑与西方列强势均力敌的国际地位，亚洲团结互助这样的主张只停留在厌恶西方的少数人当中。而且，以“亚细亚”为单位思考的政治认识在中国也没有扩散开来。孙文可以说是一个例外。1924年，他在大阪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的主张。但这不过是用日本人喜欢的亚细亚团结互助观来抑制日本人的帝国主义倾向罢了。

之后，日本人理解的“亚洲”扩大到了西方，包含了原来西方人所想象的亚洲的整个区域。日俄战争之后，中东的穆斯林计划与日本的合作而访日。与其接触的梵文研究者大川周明将目光扩大到伊斯兰教，提倡包含穆斯林在内的亚洲复兴，写就了《复兴亚细亚诸问题》等著作。然而，他虽然认为为了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有必要提倡亚细亚连结互助，但同时又无视朝鲜·中国等有可能成为日本帝国主

义殖民对象的国家。就这样，伴随着“亚洲”概念的向西扩大，日本人原来理解的“亚洲”时而被称为“东亚”。

1931年以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再度开始采取对外扩张政策，自诩“亚洲”盟主，并努力将此正当化。一开始日本在伪满洲国创立“协和会”，将日本民族置于“五族协和”中五族的顶点，之后又与欧美诸国为敌发动世界战争，1943年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达到了高潮。当然这次会议也集结了不少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当中谋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家。其中，印度独立运动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来到日本是其在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活动未果之后，尽管印度即便摆脱西方的控制也有可能被日本重新控制，但对他来说，只要能对抗英国什么力量都加以利用<sup>9</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日本从亚洲大陆各处殖民地撤军，日本国内也被纳入美军占领之下，西化再度成为政策主流。东亚因冷战而分裂，这也助长了西化改革的风气。然而，亚洲主义虽然退居非主流，但作为一种补充性质的思想意识，在缓和被美军强制占领和西化所带来的屈辱感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sup>10</sup>。

## 结语

如今，21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一说甚嚣尘上。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毫无疑问，也是由这种对未来的预想所引起的。在经历了20世纪的“日本的世纪”之后，“东亚”说不定又回到19世纪之前。

然而，今天的东亚，又有多少人期望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呢？确实有人将“东亚”视为一个区域，但是与欧洲不同，东亚各国的大小差异太大。在此能否建立平等的关系呢？中国是否跟20世纪的日本一样，希望做东亚盟主呢？还是在探索别的道路呢。周边各国又是如何构筑与中国·美国·欧洲，以及与临近各国之间的关系呢？

本次演讲重点阐述了19世纪关于区域的想象力在东亚的诞生，以及日本对传统中华世界的挑战，并谈及日本在20世纪前半段尝试做东亚盟主最终失败了的历史经过。本次与会者将就对西方的认识、对传统的挑战和创造、跨国人员的流动这三个主题进行发言，并不直接讨论力量关系、国际秩序的转换等议题。但上述主题都与东亚的未来、国际秩序的转换相关，希望与会者能思考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做好自己的研究发表，更重要的是倾听他人的研究发表，联系自己的问题意识进一步展开讨论。这不仅有助于自身的成长，同时也是难得发现境外的学友的绝好机会。

---

<sup>1</sup>本稿的详细论述请参照以下书目。三谷博《“亚洲”概念的接受与吸收》、朴忠锡·渡边浩编《韩国·日本·“西方”》（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5年）。以下只注释上述文献以外的参考文献。

<sup>2</sup>新井白石《采览异言》、18世纪初期。

<sup>3</sup>冯明珠编《经纬天下》国立故宫博物院、民国94年（2005年）。

<sup>4</sup>赤岭守《琉球王国：东亚的基石》讲谈社、2004年。村井章介·三谷博编《从琉球看世界史》山川出版社、2011年。

<sup>5</sup>并木赖寿《明治初期的兴亚论和曾根俊虎》《思考近现代的日中关系》研文出版社、2012年。

<sup>6</sup>平野健一郎《黄遵宪〈朝鲜策略〉异本校合——近代初期东亚国际政治关系中三种文化的交错——》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国际政治》129号、2002年。

<sup>7</sup>冈本隆司《马建忠的中国近代》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

---

<sup>8</sup>Owen Nickerson Denny, *China and Korea* (Seoul, 1888). Denny was an American Adviser of Korea, 1886-1890. 冈本隆司校订·译注《Owen Nickerson Denny<清韩论>》东北亚文献研究会（横滨：成文社）、2010年。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 近代清韩关系与东亚命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sup>9</sup>长崎畅子《印度独立 逆光中的钱德拉·鲍斯》朝日新闻社、1989年。

<sup>10</sup>近来，亚洲各地都出版了不少关于亚洲主义的总括性研究。今后的研究必定会参照这些研究。松浦正孝编《亚洲主义谈的是什么》Minerva 书房、2013年。